

【区域高质量发展】

区域高质量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

贺灿飞 李伟

摘要: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具有合理性。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技术周期、技术关联与技术发展方向3个方面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业发展路径,探讨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经济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并就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经济韧性与社会保护问题进行分析意义重大。未来,准确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构建演化发展经济地理学将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创新驱动;产业演替;产业创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33-10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地方互动与区域产业重构”(417312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机理研究”(42001140)。

作者简介:贺灿飞,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李伟,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南京 210023)。

各地区如何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需要进行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需发挥学科优势,展开深入探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度性,包括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等不同方面(刘志彪,2018)。本文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与演替问题,主要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展开探讨。21世纪,演化经济地理学逐步形成,将区域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形成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新陈代谢过程,侧重于从知识与技术角度研究区域新旧产业演替规律(贺灿飞和李伟,2020)。区域新旧产业演替的速度、方向、驱动因素与影响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成,现有产业资本报酬递减,未来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这些发展条件的变化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

论假定和前提越来越相似。建立在发达国家核心地区创新与产业实践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必能为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背景

区域产业发展一直都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与主流经济学主要从要素禀赋角度探讨国家产业演变不同(林毅夫,2014),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知识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内生性的新旧产业演替。为此,学者们引入了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和复杂系统理论,形成了初步性的理论框架(Essletzbichler, et al., 2010; Martin and Sunley, 2006; Martin and Sunley, 2007)。随着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区域新旧产业演替中的制度变迁与政治经济博弈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MacKinnon, et al., 2009; MacKinnon, et al.,

2019; Pike, et al., 2016; 胡晓辉、朱晟君、Hassink, 2020)。

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学界主要对区域新旧产业演替机制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认为新产业从现有产业分化而来的,并且二者存在较强技术关联性(Boschma, Minondo and Navarro, 2013),地区存量知识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Martin and Sunley, 2006)。在特定时期,地区要跳出舒适圈,向新的关联性较弱的知识、技术与产业领域迈进(郑江淮、冉征, 2021),打破路径依赖。引入外部资源、推动本地组织机构学习全新的知识与技术是打破路径依赖的重要基础。当然,区域产业演化不仅仅涉及新产业的创生,还涉及现有产业的存续与退出(Boschma and Martin, 2010)。一些地区现有产业持续存在、占据资源、利益锁定、难以退出,导致区域产业发展路径锁定,新的产业难以形成。第二,一些学者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相结合,分析不同类型区域创新系统产业演化特点及应采取的对策措施(Isaksen and Trippel, 2017)。经济发达地区既能够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化,也能实现路径打破型产业创生,要完善地区创新系统,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专业化地区产业更新能力较弱,会产生路径锁定问题(Chaminade, et al., 2019),要进行系统更新,建立外部知识连接。落后地区不具备创造新产业的内在能力(Isaksen, 2015),需要从外部移植高成长性的企业。第三,一些学者深入行业层面研究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李伟、贺灿飞, 2020),重点关注新产业形成过程中关键资源如知识、资本、市场和合法化的形成与整合(Binz, Truffer and Coenen, 2016),以及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等主体的作用(Jolly, Grillitsch and Hansen, 2020; Semper, 2019)。从产业生命周期来看,新产业发展可以分为导入期、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等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技术创新模式、融资资金来源与市场消费模式都会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要动态调整自身行为、相应制度与政策(Perez, 2003; 陈平、刘刚, 2014)。一是在导入期,大学与研究机构是前沿知识探索的重要主体,国家要给予合理财政分配。这时由于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私人投资者往往不愿意冒险投资

(陈平、刘刚, 2014)。二是当新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前期阶段时,金融资本、私人资本与风险投资蜂拥而至,形成大量新企业,进行多样化技术探索(Perez, 2003)。这一时期市场扩张迅速,企业股票价格飞涨甚至可能产生泡沫。政府要维持良好竞争环境,甚至采取金融管制措施。在快速增长期的后期阶段,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退出市场,胜出企业不断优化工艺流程,融资模式转向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三是在成熟发展阶段,企业利润下降,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政府要制定反垄断政策,防止少数寡头操控市场(陈平, 2019),防止垄断企业阻碍新技术与新产业的产生与成长。第四,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经济系统转型。一些行业的发展并非在原有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内进行延伸,而是会重塑技术—经济—社会范式(Perez, 2009; 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8)。除了要推动自身行业发展,还要开发互补性技术,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在系统层面嵌入和改造整个社会物质形态(Isaksen, et al., 2019)。要对现有制度法律体系进行调整,重塑社会文化形态,使新产业合法化,推动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Freeman, 2019)。要防止旧有利益集团通过短期大幅降价、兼并收购等手段阻碍新产业的发展,防止政府被守旧势力捕获,制定出不利于新产业扩张的政策(Aghion, Antonin and Bunel, 2021)。第五,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Hassink, 2010; 胡晓辉, 2012)。区域经济韧性可分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适应韧性(Boschma, 2015)。演化理论强调适应韧性,认为地区要主动变革,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Pike, Dawley and Tomaney, 2010),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以实现地区经济更新的过程。在发展新产业与淘汰落后产业过程中,企业、政府和各类机构要发挥集体能动性,对地区企业组织、集群网络、政企关系、制度与规制体系等做系统性变革,单兵突进无法取得较好效果(Hu and Yang, 2019)。当然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如忽视了国家层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忽视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投资和出口等手段的切换,简单地企业层面的产业链韧性等同于区域层面的经济韧性等。

二、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较为丰富,包括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多个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区域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在于实现高质量的产业演替,既包括推动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产业的创生,也包括在恰当时机,以恰当节奏推动旧产业退出,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具体可以从产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在产业层面,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新产业具有技术前沿性。二是产业创生具有内生性。三是新产业发展具有方向性。四是旧产业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对新产业创生的阻碍作用小。新产业的前沿性是指要发展那些处于科技前沿的、技术路线尚未明确、处于快速变化阶段中的新兴产业,从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获得先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产业创生的内生性是指地区达到技术前沿后,新产业并非从外部移植而来,而是在本地知识生产基础上内生创造而来。新产业发展的方向性要求新产业是使命导向型的,有助于缓解或解决当今时代人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差距扩大等。要防止旧产业过度占据资源,凭借垄断地位阻碍新技术、新产业的产生。与上一轮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广义制度结构需要随着新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区域层面,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知识、技术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三是降低区域新旧产业演替对社会的负面冲击。要保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既不过度专业化,导致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吸收非关联性新知识,也不过度多样化,导致无法形成有代表性的、有竞争力的关联性产业群。要保持区域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保持一定经济冗余、连接度与开放性,关联性产业群发展到特定阶段时,向非关联性产业领域迈进。要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从而既能应对短期经济冲击,又能在较长时间范围内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地区推动新旧产业更

替时,要把握好新旧产业更替的速度与节奏,把握好政策力度,防止旧产业过速过快退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三、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其内在要求的独特性。以下将从发展路径、经济主体和区域经济韧性视角进行逐一分析。

1. 对发展路径的要求

第一,技术周期视角。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一些地区要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窗口,获得先发优势,从而实现赶超。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来自于成熟产业中由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导致的后发优势,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新兴产业领域的先发优势与引领地位(Lee, Gao and Li, 2016)。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尚处于模糊地带的、导入期的、技术周期较短的新兴产业领域,而不是优先攻克那些发达国家已有较多技术积累、投入较大、技术壁垒较高、技术周期较长的已有产业领域(Lee, 2013; Lee, 2019)。

从韩国的实践看,20世纪80年代,韩国已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动力趋缓,这时韩国跳过一些发展难度较大的产业领域,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机会窗口,直接发展尚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电子信息与通讯产业,与美欧日在世界最前沿的产业领域展开竞争,大力发展芯片、手机等相关产业,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Lee, 2013)。等到发展水平有进一步提升、资本更加雄厚后,再去突破发达国家已有较多知识积累、技术周期较长、研发投入较高的产业领域,如医药业(Lee and Lee, 2021)。可以说,韩国正是由于抓住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才真正实现了赶超。当然,电子信息与通讯业的技术周期都相对较短,韩国学者才总结认为要优先发展处于世界前沿的短周期技术。

韩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当前

中国要实现赶超就要优先发展那些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获得先发优势,尤其是要着眼于技术周期较短的产业。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末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开启、机会窗口尚未打开,因此中国并没有换道超车的可能,只能做好直道超车的准备,在现有关键产业领域实现突破(封凯栋、纪怡,2021)。但从宏观角度讲,现有产业已经过了过去40年的黄金增长期,在需求增长放缓的条件下,实现技术突破的难度在增加,要解决好关键技术应用难的问题(郭年顺、李君然,2019)。就区域经济而言,当前南方与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如果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于南方地区,则南北经济差距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如果北方地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则南北差距可能缩小。不过,如果当前确实仍处于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末期,短期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尚不能打开,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南北方经济差距将难以缩小。

第二,技术关联视角。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演化路径与新旧产业更替速率都会发生较大变化。从产业演化路径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主要表现为关联性移植和非关联性移植。关联性移植是指后发国家移植世界上已有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与本地产业基础较为相似。非关联性移植是指后发国家移植世界上已有的产业,但是这些新产业与本地产业的关联性相对较弱。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关联性移植占主导,但非关联性移植也相对较多(李伟,2021)。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前,中国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较低,这时即使移植非关联性产业,也能获得市场竞争力。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引入外资企业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外资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与技术,而不依赖于中国本地的知识与技术,这也是非关联性移植占比较高的原因(李伟、贺灿飞,2021)。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可以从外部移植的产业已越来越少,必须在本地已有知识与技术基础进行内生性的产业分化或创造出全新的新兴产业,产业演化模式将与发达国家越来越相似。中国

区域产业演化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内生性的产业分化与建立在颠覆性技术基础上的产业创生。内生的产业分化是指在现有知识、技术与基础上衍生出与之关联度较高的新兴产业。企业迁移到与技术关联性较高的地区,有利于找到关联性知识和具有相似技能的劳动力,有利于获得先发优势,抵消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颠覆性产业的创生需要大学与研究机构创造出全新知识与技术,实现商业化,甚至变革现有技术—经济范式。总之,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将增强,会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内生性的产业创造模式。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区域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旧产业的更替过程,包括新产业进入、在位产业存续和在位产业退出。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地区产业进入率、产业存续率与产业退出率将会发生变化。有学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1998—2012年产业进入率、产业存续率和产业退出率的变化(李伟,2021)。1998—2004年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前,中国产业进入率不断提升、产业存续率不断降低、产业退出率不断提升,区域产业更替速度相对较快,新产业不断取代在位产业。并且,在新产业中,路径突破型新产业的占比不断提高。2004—2012年,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与新一轮重工业化,中国产业进入率不断降低、产业存续率不断提高、产业退出率不断降低,新产业取代在位产业的速度明显降低,许多产业固化在特定地区。即使在新产业之中,路径依赖型新产业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在未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更替的速度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产业空间锁定现象可能会更加突出。产业空间锁定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现有产业技术水平提升与相关多样化分化,但长期内要防止地区陷入路径锁定。

分区域来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东部发达省份进行了更多的非关联性移植,实现了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但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主要进行关联性移植,某种程度上说,已经陷入了产业发展的路径锁定(李伟、贺灿飞,2021)。未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既要在现有知识与技术基础上内生分化出关联性新兴产业,也要考虑推动颠覆性技术的创生,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西

部地区的普通地级市要打破路径依赖,发展非关联性新产业;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要直接去发展新兴产业,这样才能实现赶超,缩小差距。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或北方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大、未来收入增长较快,可以利用接近市场的优势,发展增长潜力大的非关联性产业与新兴产业,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第三,技术发展方向视角。

应对当代重大社会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人口老龄化与发展不平衡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重塑现有产业体系如实现产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挑战的重要手段。一些地区要以改造或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社会系统为目标,提前探索与试点,开发数字技术、低碳技术与就业增长型技术,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新市场,重塑制度与文化观念,实现生产模式与消费的转型(余振、龚惠文、胡晓辉,2021)。转型是一个系统过程,必然涉及包括企业、研发机构、咨询服务机构、政府等在内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的经济主体,发达地区存在较强的网络锁定效应,甚至守旧势力。可以先在一些产业发展薄弱、现有利益牵绊少、网络锁定效应弱的地区进行试点,构建新的生产生活场景及技术—制度支撑体系,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典范;随着吸引力的提升,各类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起到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将新兴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标准、规则输出到全球,占领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2.对经济主体的要求

第一,国家能力转型。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看,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与新旧产业更替速率将发生较大变化,要求政府与企业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国家,国家政策的目标在于引入国外成熟技术、构建产品生产能力(相对于技术能力),促进出口(封凯栋、姜子莹,2020)。在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大背景下,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府担保贷款、低价工业用地、产业投资基金等是地方政府移植关联性与非关联性产业的重要手段。政府掌握较为集中的决策权,扶持特定企业与产业。之后,政府与少数被扶持企业保持高强度互动,保障关键企业长期存

续,让企业不断积累并提升技术水平。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介入的目标已不再是引入国外成熟技术、构建产品生产能力,而是构建本地知识生产能力,促进本地知识扩散,内生性的创造关联性新产业与颠覆性新产业(Malerba and Lee,2021;封凯栋、姜子莹,2020)。这时,知识创造者的范畴超出了原来被引入、被扶持的重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新创企业尤其是新兴的中小企业成为知识创造的主体。政府要推动大学与研究机构新知识、新技术的商业化,要与大量的、处于产业萌芽阶段的新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保持高密度的互动,鼓励新兴产业领域新兴企业的多样化技术探索,为新兴企业的公平竞争提供保障,让市场在技术路线选择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限制大企业垄断,保持新兴产业领域一定的竞争强度,推动产业动态演化(Aghion, Antonin and Banel,2021)。

当颠覆性技术出现时,政府要在技术—经济体制层面发展互补性技术、建设互补性基础设施、提升新技术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修改法律法规、重塑社会风俗与文化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原有产业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政府要防止守旧势力与利益集团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防止原有产业利益集团占用过多资源(李伟和贺灿飞,2020),主动淘汰落后产业,推动低效企业退出,保障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之中。从日本的经验看,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要更加精准,避免宏观政策客观上保护低效落后企业,使其不断获得贷款,不能及时退出市场,阻碍高效企业的成长(蔡昉,2021)。要形成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在落后部门与新兴部门之间快速转移。否则,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将降低知识与技术的扩散速度。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对由创造性毁灭导致的结构性失业(Aghion, Antonin and Banel,2021)。

第二,企业能力提升。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主动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负责研发、设计与销售,中国企业按照指令进行生产,本地企业的技术学习被整合到跨国公司学习系统之中。中国出口加工企业在干中学,掌握了机器设备操作技能,掌握了现有产品的生产流程。但是,大量企业无法在现有产品生产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模

仿,无法对现有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更不具备开发全新产品的能力。开发全新产品要在整体上把握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在各个环节的链式反馈中不断动态调整,从而最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导致本地企业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相对缺失,企业研发能力、市场调研能力、全球销售网络的搭建与控制能力以及对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能力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原来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领域及其所在地区,要在特定时间内主动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脱钩(Lee, 2019),适度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适度推动企业垂直一体化,提升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企业感知、挖掘、掌控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力量。等到本地企业能力补全后,要以“链主”的身份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Yeung, 2016),这是部分韩国企业与产业成功追赶的经验,即先融入全球价值链,然后在特定时间内断开全球价值链,推动垂直一体化,培养自己的研发设计与市场能力,最后再次按照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组织生产(Lee, 2019)。这样,一些外向型的地区才能真正实现由外生性向内生性的产业演替转变。当然,这一过程也会伴随着“专精特新”等隐性冠军企业的成长,需要国家层面的一系列配合,如维护良好的贸易与对外投资环境,保障企业到海外搭建研发前哨,建立全球市场网络。

第三,创新系统重建。

除了提升企业能力、掌控全球价值链,还要构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跨国公司将本地企业的知识学习过程整合到自己的生产过程之中,削弱了本地企业与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中国大学科技论文的发表指向了国外最前沿的技术与工业实践,而并不完全指向本地技术进步与工业实践,这也是本地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相互分离的重要原因。在高速增长阶段,本地创新系统实际是被肢解的、破碎的、各自为战的、缺乏内向整合的。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要构建起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紧密联系的,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以本地知识创造为基础,内生性地创造新兴产业。当前,中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许多中国企业已具有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要

适当调整大学与研究机构的评价体系,让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知识生产与本地工业实践相结合,让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市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自主把握技术前进方向,形成自身独特的技术演进路径。在构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时,要完善体制机制,在系统层面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发挥集体能动性。

3.对经济韧性的要求

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类外部与内部冲击,要提升区域经济韧性,避免系统崩溃或陷入长期衰退。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宏观经济曾出现过短期大起大落现象。之后,中国吸取教训运用各类宏观经济手段变短期大起大落的强波(动)周期为微波(动)周期(陈东琪, 1992),即将经济周期的时间拉长,在经济上行期防止上升过快,在经济下行期防止暴跌,从而在较长的时间内熨平经济波动(陈东琪, 2009; 刘伟、蔡志洲, 202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部出口市场受到冲击,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来稳住经济增长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果遇到短期外部冲击,可以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稳住内需,使区域经济恢复到受冲击前的水平,即演化经济地理学所说的短期适应性。就中长期而言,如果在中长期内遇到特定产业市场饱和或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则可以移植关联性或非关联性新产业来维持增长势头。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复制的产业也已经复制完毕,现有产业进入资本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如果遇到外部经济冲击,再进行大规模投资拉动,其效果将大大减弱。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消费来稳住需求增长。但扩大家庭消费支出会导致储蓄减少,影响未来新产业的投资与未来潜在增长,甚至产生负债消费并导致债务问题。从较为长期的视角看,地区要保持开放性与一定的经济冗余,不断投资并生成新兴产业,不断改变自身组织与制度安排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抵消旧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一些地区可能会遇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问题,一些颠覆性产业部门出现,将另外一些产业部门淘汰,导致产业结构性衰退与失业。这时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应社会政策与就业政策,为失业人群提供保障,对失业人群进行再培训,推动技能转换,使失业

人员能够转移到新兴产业之中。政策上要把握好新产业就业创造与旧产业就业岗位减少之间的平衡,掌握好政策力度与节奏。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文章立足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转变,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1. 研究结论

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产业转型与升级、企业价值链提升与创新能力提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等方面。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显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有其合理性。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不断扩大投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在发展工业过程中不断进行模仿创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当前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传统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现有产业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能够复制的产业已基本复制完毕,能够学习到的技术与模仿创新都趋于减少,因此未来必须走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内生产业创造之路。演化经济地理学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理论假设暗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接近充分就业、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等,在此假设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建立在知识创造、技术进步与创新基础上的新产业部门。因此,要从知识与技术角度而非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要素禀赋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条件已与欧洲和美国越来越接近,也越来越需要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来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产业演替问题,包括新兴产业培育与旧产业退出等。

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探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的差异、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机理、区域转型和区域经济韧性等问题。第一,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认知邻近与技术

关联等概念推导出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提出了相关多样化分化(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分化)与不相关多样化分化(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等概念。后发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主体或建立外部连接而打破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第二,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专业化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产业演化路径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内在产业分化能力,专业化地区大多只能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化,而落后地区大多缺乏进行产业分化的内在能力。第三,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依赖于不断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新产业发展路径。新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导入期、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市场培育与拓展等会发生变化,要求企业、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维度上发挥不同作用,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第四,在新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还要在系统层面发展互补性技术、新型基础设施、调整法律法规与社会文化氛围等。要防止守旧势力过度占据或垄断资源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五,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区域经济韧性,认为当区域经济遇到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冲击或有大的宏观趋势性与转折性变化时,地区内部组织、结构与制度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不断发展出新兴产业来抵消这些冲击。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看来,第一,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主要通过移植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或较为成熟的产业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达地区或具有一定技术积累的地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优先发展那些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模糊地带的和处于导入期的新兴产业。鉴于中国还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阶段,应重点关注那些技术周期较短的新兴产业。这类新兴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抢先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抓住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取得领先地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赶超。这实际上也是北方地区打破区域产业发展路径、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途径。第二,中国区域产业发展要从移植模式向内生产创造模式转变。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各地区主要通过关联性移植和非关联性移植来发展新产业。未来,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在现有知识与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拓展,进行关联性分化,内生创造出新兴产业,这些

内生创造出的新兴产业有时也会具有颠覆性。第三,从关联性移植与非关联性移植到内生创造新兴产业,要求转变政府政策、提升企业能力、重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政府要从扶持特定企业和产业,与这些企业与产业保持高强度互动的模式,转变为与大量新兴的中小企业进行高密度互动的模式。这样,政府才能理解新兴产业中大量中小企业进行的多样化技术探索,为政策制定提供基础。当新兴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时,要在系统层面进行设计,发展互补性技术与相应基础设施,调整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市场需求,防止现有产业利益集团与守旧势力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等。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线,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被跨国公司所整合,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以国外学术前沿及其工业实践为基本场景,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与本地知识生产机构相互分离,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难以形成。未来,在部分产业领域的追赶中,本土企业要适度兼并重组,提升研究设计能力,建立全球销售网络,掌握系统层面的集成与协调能力。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政府要分散化地资助新兴研究方向与机构,促进本地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密切联系,构建本土创新共同体,形成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第四,在高速增长阶段,区域经济韧性问题实际并不突出,如果遇到较大较长时间的外部需求冲击,则可变出口导向转型经济为投资驱动型经济,移植关联性与非关联性新兴产业,从而维持住增长势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遇到短期外生冲击,政府仍然可以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手段进行短期应对。从长期来看,一些内生创造出的新兴产业可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导致某些产业的消失与毁灭、某些地区的经济衰退,这时政府要采取政策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

2. 研究展望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不仅涉及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问题,还包括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文章仅关注了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演替问题,未来还要借鉴相关理论进行更全面的研究。第二,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启示主要

体现在供给侧方面,实际上,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分配领域的调整与需求侧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调节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以及居民内部的分配结构,才更有利于扩大总消费需求,总需求的扩张才更有助于拉动总供给与新兴产业的扩张。否则,总需求扩展缓慢必然降低新兴产业的扩张,降低区域新旧产业更替的速度。与此同时,政府要调节支出结构,减少对传统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增加对广义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有利于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有助于新产业的产生与区域产业新旧更替。对分配领域和需求侧的研究需要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之中,才能在更大的经济循环中全面认识区域产业演替机理。第三,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既需要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获得先发优势,又需要在一些已有产业领域实现追赶。文章对已有产业领域追赶的分析还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起来,未来需要将二者结合,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新兴产业与技术—经济范式内的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进行明确区分,未来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第四,区域产业演替实际上包含了新产业的进入、在位产业存续以及在位产业退出过程,文章的研究重点是新产业进入,而没有对在位产业的存续及其渐进式创新等进行分析,也没有对旧产业的退出进行深入分析。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下,存在许多僵尸企业与僵尸产业,这些企业与产业长期占据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会对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影响,其实质是一种逆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蔡昉,2021)。未来需要基于中国体制,对区域产业演替中的产业退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五,实现内生性的产业演替需要教育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劳动力与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等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文章未对这些进行深入分析。第六,文章只是较为笼统地将发展阶段划分为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实际上可以更加细化。例如,就高速增长阶段而言,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刘易斯拐点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和刚达到刘易斯拐点后的资本深化阶段,进而比较这两个阶段产业演替特征与创新发展阶段产业演替的差异。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就发达国家核心地区产业演替特征展开研究,而忽视了

前两个阶段。未来应基于后发国家实践建立一门演化发展经济地理学,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演替的方式、速度、动力机制与影响等,这样可以为更多后发国家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C ANTONIN, S BUNEL.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 BINZ C, B TRUFFER, L COENEN. Path Creation as a Process of Resource Alignment and Anchoring: Industry Formation for On-Site Water Recycling in Beijing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2).
- [3] BOSCHMA R.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 [J]. *Regional Studies*, 2015(5).
- [4] BOSCHMA R, R MARTIN. The aims and scop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Boschma R and R Martin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5] BOSCHMA R, A MINONDO, M NAVARR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 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1).
- [6] CHAMINADE C, M BELLANDI, M PLECHERO, et al.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path renewal and creation in thick specializ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two textile districts in Italy and Sweden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10).
- [7] ESSLETZBICHLER J, D L RIGBY, R BOSCHMA, et al.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Boschma R and R Martin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8] FREEMAN C. History, Co-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9(1).
- [9] HASSINK R. Locked in decline? On the role of regional lock-ins in old industrial areas [N]. In: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10] HU X, C YA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ivergent economic resilience: Path development of two resource-depleted cities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19(16).
- [11] ISAKSEN 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n regions: trapped in path exten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3).
- [12] ISAKSEN A, S-E JAKOBSEN, R NJØS, et al.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sulting from individual and system agency [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1).
- [13] ISAKSEN A, M TRIPPL. Exogenously Led and Policy-Supported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Analytical and Synthetic Rout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5).
- [14] JOLLY S, M GRILLITSCH, T HANSEN. Agency and actors in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 [J]. *Geoforum*, 2020(5).
- [15] LEE J, K LEE. Catching-up national innovations systems (NIS) in China and post-catching-up NIS in Korea and Taiwan: verifying the detour hypothe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11).
- [16] LEE K. 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economic catch-up: Knowledge, path-creation,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7] LEE K. The art of economic catch-up: Barriers, detours and leapfrogging in innovation system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8] LEE K, X GAO, X LI. Industrial catch-up in China: a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perspectiv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6(1).
- [19] MACKINNON D, A CUMBERS, A PIKE, et al.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apt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2).
- [20] MACKINNON D, S DAWLEY, A PIKE, et al. Rethinking Path Creation: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2).
- [21] MALERBA F, K LE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catch-up by latecomers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21(4).
- [22] MARTIN R, P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4).
- [23] MARTIN R, P SUNLEY.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5).
- [24] NELSON R R. Co-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995(2).
- [25]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26]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1).

- [27] PIKE A, S DAWLEY, J TOMANEY. Resilience, adaptation and adaptabilit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
- [28] PIKE A, D MACKINNON, A CUMBERS, et al. Doing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2).
- [29] SCHOT J, W E STEINMUELLER. Three frames for innovation policy: R&D,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 [J]. Research Policy, 2018(9).
- [30] SEMPER D. Machina ex Deus? From Distributed to Orchestrated Agency [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019(3).
- [31] YEUNG H W-C.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2] 蔡昉. 从日本经济表现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 [J]. 日本学刊, 2021(4).
- [33] 蔡昉. 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 [34] 陈东琪. 强波经济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35] 陈东琪等著. 繁荣与紧缩——中国 2003-2007 年的宏观调控 [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9.
- [36] 陈平. 代谢增长论: 技术小波和文明兴衰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37] 陈平, 刘刚. 代谢增长论: 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J]. 清华政治经济学报, 2014(1).
- [38] 封凯栋, 姜子莹. 国家在创新转型中的双重角色: 创新理论视角下发展型国家兴衰对中国政策选择的启示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6).
- [39] 封凯栋, 李君然. 技能的政治经济学: 三组关键命题 [J]. 北大政治学评论, 2018(2).
- [40] 郭年顺, 李君然. 本土半导体企业打破“后进者困境”的路径和机制——以华为海思为例 [J]. 企业经济, 2019(6).
- [41] 胡晓辉. 区域经济弹性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8).
- [42] 胡晓辉, 朱晟君, R HASSINK. 超越“演化”: 老工业区重构研究进展与范式反思 [J]. 地理研究, 2020(5).
- [43] 黄阳华. 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兼论构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 [J].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1(1).
- [44] 李伟.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 从双重空间打破到双重空间锁定 [D].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后出站报告, 2021.
- [45] 李伟, 贺灿飞. 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 研究述评与展望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6).
- [46] 李伟, 贺灿飞.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 [J]. 地理研究, 2021(5).
- [47] 李伟, 贺灿飞.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4).
- [48]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49] 刘伟, 蔡志洲. 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 [J]. 管理世界, 2021(5).
- [50] 许宪春, 雷泽坤, 窦园园. 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2).
- [51] 余振, 龚惠文, 胡晓辉. 可持续性转型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3).
- [52] 郑江淮, 冉征. 走出创新“舒适区”: 地区技术多样化的动态性及其增长效应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e Canfei Li Wei

Abstract: Birth-death process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us in-depth analysis of birth-death process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s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echnology cycle, technology relatednes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behavioral change of economic 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s. This study also analys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ly, 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on the basis of China's practice will b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gional high-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Birth-death Process of Regional Industries; Creation of New Industries

(责任编辑:文 锐)